

中国道路: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

巨大的裂变冲击力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观后感

■ 李后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但没有留下多少记忆。这是时代的遗憾还是影视界的悲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终于给我惊喜,就像是核弹爆炸带来的巨大震撼与冲击!

我在沉思,这就是裂变反应的威力?可能是,电视剧引爆了人们心中深藏的核能,冲击波的扩散力、穿透力和征服力,席卷华夏大地,释放出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益。

48集电视剧,一部辉煌的史诗,把日常化、平民化、数字化用到了极致,就像划过夜空的雷电,照亮了心灵,点燃了大众激情,提升了道德能级。

根据大数据分析,这部电视剧具有超高收视率,观众突破一亿,同类题材少有先例!

“虚实结合、家国同构”的叙事方式,打破了符号化和脸谱化的传统模式。

电影技巧的有效借用,高层与底层的揭秘,敏感人物不回避,实现了政治与艺术的真正统一,彰显了编剧、导演和演员的高超技艺。

空间切割精确,1976年到1984年是中国重大变革时期,百废待举;

主线设计精当,把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作为主题,复杂无与伦比;

心理把握精细,把神还原到人,一点一滴,在平凡中书写传奇;

画面拍摄精致,从面部到手势,每个镜头都凸显着扎实的功底;

亮点展示精妙,政治“脱敏”,还原历史,每一段都可以作为经典案例;

虚实对接精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细腻、合理,浑然一体。

众多的突破和创新,无法全部列举,已经融入对伟人的缅怀与追思。

总之,这是难得的精品大戏,虽有小瑕疵,

仍为影视界赢得了荣誉,注入了活力与生机。

让我们在享受视觉美感的同时,唤醒了三十八年前的苦涩记忆;

让我们在回顾道路艰辛的同时,充满了对小平同志的无限敬意;

让我们在审视国际潮流的同时,激发了勇于超越的昂扬斗志;

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我们必须倍加珍惜。

为了中国梦,我们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全面深化改革,奋斗不息!

(本文是李后强教授2014年9月5日参加《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座谈会感言)

主旋律电视剧创作的重大收获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观后感

■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 向荣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历》)是一部重现民族记忆、具有史诗风范的扛鼎之作,也是近年来主旋律影视剧创作的重大收获。《历》以全景式的宏大视野、多维度的生活画面、多样化的影视手法,深刻形象地反映了我国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实现伟大转折的重要历史,真实客观地再现了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拨乱反正、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生动实践和艰难历程。

对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来说,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在对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叙事表现上,以及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史实与诗学的艺术处理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难度和限制。因其如此,历史叙事模式化、人物形象符号化往往成为主旋律影视作品、特别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难以超越的“瓶颈”,从而影响了主流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社会渗透。电视剧《历》在长达五年的创作实践中,秉承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不断开拓创新的探索勇气,在历史叙事和人物塑造上彰显出得到主流人群认同的个性特色,实现了艺术超越,具有特殊的审美价值和思想意义。

虚实相生、家国同构的历史叙事是电视剧《历》最大的亮点。家庭的沉浮折射出国家的动荡,国家的变革则主导着家庭的命运。这种家国一体的史诗化叙事形式,既生动流畅又客观真实地再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实现历史转折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粉碎“四人帮”到“小平复出”、从“恢复高考”到“拨乱反正”、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平反冤假错案”、“知青返城”等国家重大决策,在邓小平拨乱反、解放思想的政治实践中相继出台和贯彻实施,从此改变了包括田志远、夏默两家在内的亿万人民和家庭的历史命运。

在“家国同构”的历史叙事中,坚持从日常化和平民化的视角塑造历史伟人邓小平,是电视剧打动人心的显著特色。将邓小平在历史转折中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智慧融化在日常生活,从他个人平实的情感生活层面着力表现伟人的夫妻情、父子情、爷孙情、战友情和同志情,突破了伟人形象符号化、单一化的叙事局限,使伟人形象的人格内涵更加丰富饱满,也更有精气神。与此同时,电视剧还将邓小平日常化的家国情怀与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艺术地融汇在具像化的政治实践中,使伟大人物的平民色彩在举重若轻



的政治实践中得到精彩生动的视听表达。在“知青返城”的重要会议上,小平同志拍板定钉时的那句“让孩子们回来吧”的经典台词,犹如慈父的乡音,既温暖亲和,又气贯长虹。从此,两千多万“孩子们”回归城市,实现了人生历史的“伟大转折”。

在“家国同构”的历史叙事中,一些历史细节的还原和再现,也从国家政策与个体命运、宏观政治和微观人生的契合处和链接点,凸显出家国一体、休戚与共的历史感。如在“恢复高考”的历史进程中,邓小平心系天下、深谋远虑,既为“老三届”知识青年被十年文革荒废的青春岁月深感忧虑,也为民族国家未来的发展寻找人才资源。他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决定把招生对象从原来的应届毕业生扩大到全体社会青年,从而使几百万社会青年获得了改变个人命运的重要机会,也为新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事业夯实了人才基础。一个不同凡响的历史瞬间、一个精雕细刻的历史细节,真实感人地再现了邓小平的爱民情怀和远见卓识,蕴含着意味深远的历史内涵。正如电视剧总编导龙平平的深情诉说:“只要你是中国人,在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起重大作用的事情,一定可以追溯到小平同志。如果没有他的一些政策,你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就会是另一个样子”。

家国同构的史诗化叙事,把1976到1984的八年故事放进“家”与“国”命运一体的历史关联中,融入到宏大而具体的历史转折和社会变迁中,生动地再现了民族历史的公共记忆,唤起了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后来者的个人记忆和历史体验,促进他们抚今思昔的深刻反思与情感共鸣,进而建构起人们对现实生活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认同。《历》在央视播出后激发起社会各界巨大反响的现象,业已表明作为一部主旋律电视连续剧,《历》为建构当下中国的社会认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旱涝保收” 央企高管薪酬凸显四大顽疾

国资、国企改革的又一靴子——央企负责人薪酬改革落地在即。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关于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的意见》,严控中央企业高管偏高、过高收入和不合理业务支出。此次改革都针对哪些顽疾?改革会聚焦哪些方面?

顽疾一:高管薪酬“自己说了算”

一份对83家央企董事长薪酬的统计表单显示,年薪过百万的有19位,年薪超过平均值的董事长有25位,平均年薪为84万余元。而一向以高收入著称的银行高管薪酬,更是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根据上市银行年报的补充公告,建行董事长王洪章2013年税前年薪为214万元;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去年最终薪酬核定为税前199.56万元,2013年5月底才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田国立8个月的薪酬则为税前135.82万元。

“目前,副部级公务员的年平均薪酬水平大致是10多万元,而部分央企负责人的年薪酬水平达到100多万元。后者是前者的10多倍。两者收入差距偏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刘学民说。

有评论指出,国企取得的利润应该全民分享,而不能坐拥垄断优势,自己上演“排排坐、分果果”的戏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邱小平近日对改革方案作出解读:这一改革的适用范围确定为中央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负责人,包括由国务院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中央管理的企

业董事长、党委书记(党组书记)、总经理(总裁、行长等)、监事长(监事会主席)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

方案的一大亮点,在于坚持“一个标准”:不同企业任职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原则上确定相同的基本年薪。“就像省级官员,不管在上海、青海还是西藏,基本工资是一样的。”中国人事科学院院长吴江表示。

在央企负责人薪酬结构改革中,新设任期激励收入是另一大亮点。这次改革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调整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在薪酬水平的制定上,基本年薪将根据上年度中央企业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一定倍数确定;绩效年薪与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相联系,根据年度考核评价结果的不同等次,结合绩效年薪调节系数确定。

“与现行政策相比,改革后多数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水平将会下降,有的下降幅度还会比较大。”邱小平表态。

顽疾二:“穷庙富方丈”

旱涝保收、高管高薪似乎已成“定律”,翻阅近几年上市央企年报和机构调查不难发现,即便出现大幅亏损,高管年薪依然“高高在上”。

年报显示,招商轮船巨亏21.84亿元,多位高管年薪仍过百万;酒鬼酒卷入存款被盗、公务消费限令亏损3000余万元,董事长年薪仍为91.24万元;发生“丢钱”事件的*ST大荒总经理薪酬上年激增2627.50%,公司净利润却持续多年下滑连连报亏……

巨额国有资产亏损与“不食人间烟火”的

高管薪酬屡屡同时出现,刺痛人们的眼球。人们不禁质疑,国企高管的薪酬究竟是怎样制定的,在多大程度上有其合理的一面?

“从产权理论上看,所有权、经营权、分配权应该一致,但目前是分离的。国企是全民财产,管理层由国家任命。”复旦大学企业研究所所长张晖明说,“高与不高不是问题,关键是该不该拿这么多。”

海通证券分析师荀玉根也认为,权责不对等,没有业绩而给予高薪确实不合理。具体来讲,国企不合理的薪酬存在于两个方面,其一,垄断行业或企业,利用国企的特殊背景获取了垄断利润,虽然业绩不错,但高管并未为之付出相应努力,不应获得高薪;其二,处于竞争性行业的公司,业绩并不理想,即使行业的平均薪酬高,这家国企的高管也不应比照行业水平获取高薪。

“如果出现较为明确的国企改革高管任免权力下放董事会的规定,明确竞争性行业的高管考核以业绩和经营为唯一目标导向,将对国企改革形成重大利好。”荀玉根认为,“同样,在股权激励方面,如若能在激励标准上有更为明确的指导意见,放开激励力度限制,也会对市场形成正面影响。”

顽疾三:薪酬“两极分化”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行业央企薪酬两极分化严重。根据益盟操盘手统计的上市公司公开数据统计出近几年上市央企董事长、总裁、总经理薪酬数据显示,不同行业央企高管薪酬存在天壤之别。

根据上市公司资料显示,目前央企高管中还有近20个人拿着不足10万元年薪,例

如乐凯胶片总经理郑文耀,其2013年的薪酬为80670元。东阿阿胶董事长李福祚2012年和2013年的薪酬分别为51500元和60000元,加上其2013年在华润三九和华润双鹤领到的薪酬,仍低于年平均60万元左右央企高管薪酬标准。除此之外,高管和基层员工的收入差距也令人咋舌。以中行信贷风险总监一职为例,2013年平均月薪1.57万元,加上绩效部分则达2.3万元。在长三角地区,部分

银行的派遣制“编外”柜员年收入仅5万至6万元,“高管干一天,柜员干仨月”,高管薪酬超过基层员工约百倍。

有评论指出,高管拿着上百万元的年薪,相应员工却只有少之又少的5万元,这样的收入差距无疑会令员工不满,也会让员工工作情绪怠慢,影响公司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出现企业经营不当导致亏损时员工降薪,而高管加薪的不公平的现象时,更加令人愤懑。

“公众对于央企高管薪酬的质疑主要在于,高管有很多不需要在公告中披露的隐性收入。”一位业内专家说。例如,审计署6月份发布的审计结果显示,中投公司在2011年至2013年5月间,在已为员工缴纳基本医疗保险和购买补充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又为职工个人买齐重大疾病商业保险并代缴个人所得税共计3689.73万元。

在专家看来,当前急需堵住的除了“内部漏洞”,还有银行等金融机构薪酬形成机制不透明这一外部漏洞。

顽疾四:高管“官商无缝转迁”

央企高管身兼数职现象普遍,比如集团的高管在二、三级企业以及该央企投资参股

的其它企业任职,有的每年从兼职企业领取大量分红。拿保利地产来说,该公司董事长宋广菊还兼任保利南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董事彭碧宏兼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总会计师,兼任保利财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保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刘平兼任北京保利董事长,包头保利董事长,河北保利董事长;副总经理陈冬桔兼任上海保利董事长,浙江保利董事长。

“以金融业为例,国企业在业内来说薪酬不算最高。但问题在于,一部分地方国资银行、券商高管是官员任命调任来的,还频频转任回官员‘官商通吃’。”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说。

学界对“又是高官,又是高管”的双轨模式争议颇多。“百姓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国企高管既有官员身份,又要求像外资企业那样拿天价薪酬。换言之,百姓并非仇富,而是仇不公。”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要设定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就必须坚持对企业和高管进行分类。”

目前来看,改革努力的方向对准了央企薪酬制度中的四大顽疾。但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薪资恐怕也是难题。业内人士分析,随着银行薪酬制度改革,其内部有可能出现“一家企业,两种薪酬制度”的局面:一二把手参照行政体制发放薪酬,而市场化的岗位则遵循市场化薪酬体制,可能获得比负责人高出许多倍的薪资。

“混合薪酬体制可能会在国有银行内部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时间长短取决于改革的进程,以及市场发育的程度。”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

(新华财经综编)

▶▶▶[紧接P1]

有的人闻过则喜,知错即改。历来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要真正做到闻过则喜、知错即改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要做世间难为之事。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闻过则喜、知错即改的道德自信。他还举例说,我们党实行的“精兵简政”政策就是由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因为这一政策对人民有好处,所以我们党就采纳了。事实证明,我们党正是实行了“精兵简政”的政策,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才使党群关系更加密切了,从而获得了战胜一切困难的巨大力量。一段时间以来,不少共产党员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放松了自我修养,致使党纪废弛,干群关系日益紧张。特别是在一些党员干部中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广大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反映强烈。当前深入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对“四风”问题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正视“四风”问题的严重危害,立下彻底解决“四风”问题的坚定决心,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新展示我们党道德自信的表现。

其五,《为人民服务》树立了能上能下的道德典范。道德具有示范性和标杆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名和利都是他们难以跨越的珠穆朗玛峰。其实“名”也是“利”。即使在革命队伍中,也不乏追名逐利之辈。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批评的

那样,“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而张思德却为我们竖立了一个不计名利的道德标杆,他是站在道德珠峰之上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从他的革命履历来看,参加革命近11年,入党7年,先后当过战士——班长——副班长——战士——农场副队长。不论在什么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每当职务发生变化,尤其是由班长到副班长甚至到战士时,他始终坚持一切从党的需要和人民利益出发,毫无怨言地对待职务升降,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就像他本人所讲:“当班长是革命工作需要,当战士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张思德的职务由班长降为副班长直至降为战士,不是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而是我们党当时实行“精兵简政”的需要。

最后,《为人民服务》充满了勇于担当的道德使命感。道德具有自律性和正义性。共产党人要勇于担当、艰苦奋斗。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种强烈的道德使命感驱使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最终使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担当大小,体现一个干部的胸怀、勇气、格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改革是强国之路,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要闯出一条新路、杀出一条血路,也要勇于担当、艰苦奋斗。只要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具有强烈的道德使命感,我们就一定能团结亿万群众,汇聚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从而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本文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2014年9月10日在纪念《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四川省社科院)